

共和国

文学

文学

伍仁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第

①

卷

共和国 重大事件 纪实

第 1 卷

(修订版)

伍仁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SBub4/07

ey
w

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第1卷)

(修订版)

伍仁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长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5印张 370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604-1169-X/I·166

定价:19.50元

目 录

开国大典纪事

..... 贾舒云 (1)

火·冰山·鸽子的壮歌

——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 秦文玉 昊 夫 (36)

朝鲜战场访实

..... [英]艾伦·宁顿 段汝佳 杨文玉译 (106)

共和国反腐败第一案

——刘青山、张子善伏法记

..... 石玉新 鲁 兵 蓝 夫 (145)

“阳谋”——1957

..... 徐铸成 (203)

热风吹雨

——中苏摩擦与庐山会议

..... 权延赤 (220)

中国“两弹”历程揭秘

..... 彭子强 (320)

开国大典纪事

贾舒云

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都北平，一夜间，所有的城门钥匙都换了主人。

一天，齐燕铭、周子建等四人拿着周恩来副主席的令箭，连夜坐卡车从西柏坡直赶到北平，为党中央进入北平打前站。

他们走后不久，周恩来一封电报赶在他们前头到了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手里。周副主席要求打前站的人把中南海先接收下来。

中南海是傅作义的剿匪司令部。北平和平解放后，整个中南海 2000 余间房子只有勤政殿住着傅作义的一个连。他们像乌龟一样缩在那里，只有几盏孤灯发出黑漆漆的光芒。

华北军区程子华兵团派了一个连进驻中南海，他们让傅作义的连队放下武器走。

紧接着，齐燕铭等开始布置清扫工作。这时，怀仁堂已定为政协会议的会场。部队日夜兼程用卡车往外运垃圾，整整运了三

个月。

最后一车垃圾运出了中南海。天快黑，淡红色的晚霞倒映在中南海的碧波之中，像一条又一条粉红的小鱼。周子建突然想看看天安门。他顺着长安街，穿过西三座门，站在暮霭笼罩的天安门前，感到强烈失望。

这就是后城的大门么？这就是皇帝“颁诏”的场所么？他猛然摇头。

四壁朱红色的墙皮在大自然的剥蚀下，片片脱掉，像染着牛皮癣的皮肤病人一样。镀着金粉的瓦缝间长出一簇又一簇旺盛的狗尾草，门楼堞上的荆棘有人那么高。麻雀、野鸽、乌鸦一群一群飞进茅草窝里。天黑下来了，依稀可辨的白丁香和黄刺玫使这里更像一片荒凉的坟场。

两套开国阅兵方案

开国阅兵早在7月底就明确了，各兵种确定了受阅人员，很快开始了紧张又新鲜的分列式训练。开国阅兵的地点此刻还在论证。华北军区制定了两套阅兵方案。

第一方案是在城里天安门举行，受阅部队成检阅式队列立于天安门的東西两侧。第二套方案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两套方案都附有一张部队位置及阅兵行进路线的详图。

两套方案的优缺点显而易见。天安门阅兵优点很多，它地处市中心，领袖军队群众水乳交融，场面可以搞得轰轰烈烈，最主要的是阅兵台可以利用天然地形——天安门城楼，上面可以容纳全体政协代表和陪阅人员。天安门周围的路四通八达，很容易集中分散，阅兵结束后，军队可以迅速从市区消失。但是，这里阅

兵的缺陷也是无法弥补的，当日的城市交通要断绝四小时。更重要的是长安街狭窄，不能按正规阅兵行进分列式，只能横排通过步兵的八路纵队，骑兵的三路纵队和装甲部队的两种路队。在西苑机场阅兵可以避开天安门的缺陷，那里跑道很宽，也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

更何况西苑机场有一次阅兵经验，北平部队为了欢迎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在这里举行了一次万人观看的检阅式。但是，这里没有检阅台，应付小场面的检阅还凑合，开国盛会就必须搭三两个坚固的看台，工程且不说，场面也远比不上天安门壮观。这里距市区较远，几十万群众不易参加，对扩大共产党解放军的影响是个损失。阅兵部队只有一条跑道可以利用，进出极不方便。

从华北军区送上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论证者的天平明显倾斜于第一方案，即在天安门阅兵。

这份报告放在党中央的办公桌上，度过了17个白天，周恩来副主席用毛笔签署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二

刘少奇在自己的名下画了一个松子一样的圈，毛泽东和朱德虽然没有画圈，但他们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距开国盛会只有9天了，厚厚的大会筹委会成立的文件送到了党中央，文件有大会筹委会会议记录、大会程序草案和各部处布置大会会场的预算。

紧接着，天安门广场的大扫除开始了，那堆多年的垃圾山装在卡车上拉走了，屋顶上的茅草拔掉，破损的青石路面修补好了，

斑剥的宫墙重新穿了一件红衣。广场正中石板道上，竖起一根 22 米高的铁管，比天安门城楼的第一层檐还高，方圆三米的钢筋混凝土墩支撑着旗杆。这一工程由北京建设局承担，几天工夫，终于把铁管内外的接口全用烧焊箍紧，油饰一新，滑轮及轴、钢丝绳也全部各就各位。

军队加紧训练，参加大会的群众也演练了两次。第一次几十万人集中在天安门，搞得比较乱，谁也不知道谁的预定位置。

北京市工会的小萧急得没办法。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用白石灰划出场地，编上号码，规定哪支队伍站在几号方砖上，就由领队带着队伍去找方砖。果然奏效。打那以后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就有了编号。

天安门城楼上安装了一架土电梯，晃得比较厉害。有人说了个笑话，苏联专家坐土电梯上天安门，突然停电，苏联专家关了半天“禁闭”。

本来，毛泽东是可以坐电梯的，但他没有坐，只一步一步走上城楼。这是毛泽东以人民领袖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红绸布，如果没有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刻，它也许被裁成衣裤，或者被压在箱子底，一点一点地霉烂。如今，它静静地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玻璃柜里，红红的面颊上，睁着 5 双嫩黄的眼睛，40 年不眨一下。

升起第一面国旗

那一天，几位摄影师看到，天安门广场成了一块红色的湖泊，而那面成珍贵历史文物的五星红旗，突兀在红湖上，像一面红色

的风帆。

“请毛主席升旗。”

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钢丝录音带上，传出40年前林伯渠主持大会的声音。这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采制的录音原稿，没有经过技术处理，听起来身临其境。

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升旗的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显然意识到，于是小声提醒他。

“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其中增补了“国”字。

别小看这一个“国”字，旗比国旗的外延可宽泛得多。我们的国旗仅指这一面五星红旗以及它的同一样式的兄弟姐妹。按说，这是马虎不得的。这个小差错还应该算在工作人员身上，因为他第一次的小声提示就是升“旗”，而不是升“国旗”。幸亏很快就纠正了。

紧接着，话筒里又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的机关在哪里？在哪里？你说呢？

在天安门城楼上，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自言自语会通过转播台扩散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每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钻出来。不怪他们，他们在山沟里一蹲多少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还没有经验。

如果，他们知道在他们西侧的露天转播台上，那灵敏的钢丝录音带会抓住他们小声的只言片语，那他们一定缄口不言。

历史车轮终于滚到那一个庄严的时刻。

毛泽东用力地按动了电钮。

那块巨大的红布缓缓地被蓝天搂到怀里，定格在22米高的白色铁杆上。

在天安门前面东侧临时搭起的木板小屋里，大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唐永健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这时他才发觉，在旗子向上走的两分钟内，他的心一直空悬。用电钮升旗的点子，就是他想

出来的。

毛泽东不可能从天安门走下来，一下一下地拉动绳子升旗，如果由工作人员代升，播音员丁一岚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布，第一面五星红旗正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呢？

可是，电钮升旗在中国没有先例。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电力工程师，工程师答应试试看。

开国大典前一天夜里，宝蓝色的天空上悬着几粒亮晶晶的星星。天安门广场静极了，工作人员预演升国旗。

国旗慢慢地走到中途停住不动。那天晚上有点小风，但是任凭小风左一下右一下地拍打，巨大的红旗仍然飘扬不起来，好像挺悲痛似地成了半旗。这不是好兆，人们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没有一个人说话，时间似乎凝固了。猛然，有人醒悟起来，几个小时前，国旗的正南方，毛泽东主席铲下了第一锹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人们在欢呼建国的喜炮声中，没有忘记邀请为国捐躯的 820 万英灵。这面有灵气的国旗在它第一次升起时自动升在半旗位置上向烈士致哀。

这件事渐渐传成了一个美妙的神话。

翌日下午 3 时，旗杆下站着几名工作人员，他们预备着：如果电钮失灵，就用人工把旗子送上高空。

那一天，国旗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老百姓传说那一块红布通人性。

1949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登载着新华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见报前，分管新华社的胡乔木同志审查了一遍，当即对李普说：“电钮升旗的那句，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否则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

40 年前，中国人还有不少相信神灵。本来就流传着解放军飞檐走壁、神仙保佑之类的故事。再亲眼见到毛主席远离旗杆竟能把国旗升起，那又不知道要编出多少神话来呢。还是应该不嫌累赘，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用电线连着。

人民日报是这样说的：“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杆的电钮，使一面新国旗在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那一天，地面上没有风，22米的高空有些徐徐微风。中央电影局的摄影师罗光达站在天安门中间的门洞处，连续拍摄了许多升旗的镜头。于是，国旗的情影夹进了历史的画册。

图案设计来自工人作品

毛泽东主席首肯了五星红旗的图案设计。他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三天后，政协全体代表投票通过了国旗图案。

值得新闻界重视的是，在雪片般涌来的3012幅画稿中，独占鳌头的居然是一位普通工人的作品。人民日报公布了他设计的五星红旗的图案尺寸和颜色。

红色是中国人民喜爱的颜色。十几万年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山顶洞人就已经用红土来装饰居住的洞子了。从周代到清朝，大红一直是吉庆之色，它象征着热血、太阳、美好。左上方缀着五枚黄色星星，大星寓意着共产党，四枚小星寓意着建国时所包括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与此同时，四枚小黄星还寓意着4000年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灿烂文化。

整个构图简洁而不流于单调，庄严而不失于华丽。从3000竞争对手中被挑选出来，实在不是偶然的。

40年后，中国人能够如此头头是道地说出国旗的寓意，恐怕寥寥无几了。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人们张开想象的双

翼，自由飞翔更好。

开国大典之后几天，解放军冲进了重庆歌乐山下的魔窟。72小时前，整个魔窟融化在烈火之中。一位战士看见一角残破的红布条斜搭在布着墨绿苔藓的断垣上。这是一面用红布被面绣成的国旗的残片。

江姐和她的难友们听到了国旗诞生的消息，太激动了，竟忘了打听旗子的颜色，直觉告诉她们，旗是红的。人民子弟兵一出世，就为自己起名为红军。她们找来唯一的红布被面，开始绣五星，国旗还没绣完，江姐就把自己的血洒在旗上了。

与此同时，刚刚更名的北京掀起了一股抢购红布的“龙卷风”。转眼工夫，大小店铺的红布就不见踪影，旋即白布又消失，买不到红布的人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染一块红布。10月1日的早晨，每座四合院的门口都有一张五星红旗的笑脸。

那一天，全北京全中国亮出了多少面五星红旗，无法统计清楚。人民欢庆自己国家的生日，那份热情足可以赶上千百座火山的喷发。世界最高峰的峰巅，白雪覆盖的冰川上，有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它是第一位在地球最高处落户的居民。

联合国大厦正门两侧，竖立着成列的旗杆。旗林之中，同样有一面美丽的五星红旗。

历史之树默默地增长了40圈年轮。

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清晨，都有一个庄严的升旗仪式，太阳和共和国的旗帜同时辉煌。

每一个中国人和来过北京的外国人都熟悉天安门，天安门的正面形象出现在国徽里，国徽又模压在每一枚钢崩儿的背面。

天安门已经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的标志，它作为背影被装进照像机里的次数堪称世界之最。

那么，挂着八盏宫灯扬着八面红旗的节日天安门是谁装饰设计的呢？恐怕鲜为人知，如果你知道独具民族特色、又庄重又吉庆的天安门装饰竟是出自于两位日本美术家设计的，那么你一定

大吃一惊。

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几位记者正准备去日本拜访他们二位，拍一部纪录片。

80 高龄的萧野和已进入古稀的森茂都渴望在残生中再看一眼天安门。自从他们回国后，还没有机会重返第二故乡。设计天安门时，绝对想不到日后这里会成为中国的中心。他们像平时完成任务一样，精心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中国方面也没有想到应给他们额外的报酬。

萧野那时 40 上下，森茂才 30 出头，两人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正规的美术熏陶，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使他们成为开国前后第一流的美术专家。大会现场的布置由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致祥负责。他把天安门的设计工作分配给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

舞美队队长苏凡胸有成竹，他有两个宝贝部下。尽管眼下距开国大典只有 20 天。

一个星期的斗转星移，萧野和森茂用 16 开的白橡皮纸画出了 20 张草图。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日本民族的血和水，但是，日本民间保留着不少源于中国的文化，这使他们对中国并不陌生。

怎么搞才能既体现民族风格又显出浓烈的节日气氛呢？他们两人首先想到了中国的宫灯。宫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周代已有专管宫灯之官，叫司恒。民间传说鲁班营造宫殿时制作了宫灯，距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了，萧野和森茂不那么清楚这一段历史，但他们知道张灯结彩是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形式，所以，他们最先确定是十根红廊柱中间吊八盏太阳般的宫灯。

周总理最欣赏这八盏太阳般的宫灯。20 张草图交到他手里时，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一幅。他删去了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周总理说，突出城楼就够了，大会会场一定要喜庆也要严肃。

八个大红宫灯一定下来，就必须在开会之前挂上去。张致祥叫苏凡坐上他的车，满北京去买。苏凡到处碰壁，北京城压根就

没有那么大的宫灯。此时，距开会只有10天，张致祥急得直上火，两张薄嘴唇上也急出两串小泡。还是萧野，他想了想说，大宫灯小宫灯都一样，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就行。

找到唯一扎灯艺人

一句话，提醒了苏凡，他直奔故宫博物院，故宫的人一听尺寸直摇头。他们从清宫档案中找到了唯一的一个扎灯艺人。这个70老翁住在丰盛胡同一带。老艺人看看设计图，转转现场，平静地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没有做过，让我做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们一定要答应。别说一个，一百个条件也得答应呀。

这八个大宫灯，只能在天安门城楼上做，如果在底下做，将来抬不上去。老人喘了一口气又说，我只要两个人，把我的徒弟找来就行。随后老人叫苏凡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张致祥叫木工做了灯的圆托。萧野和森茂负责宫灯的装饰，他俩和大家一样，吃住在城楼上整整干了三天。

“十一”的前一天，八个飘着仙气的宫灯竣工了。张致祥调来了一队战士，搬来了几架梯子，前呼后拥，但是，人们发现小小的钉子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灯身。

萧野抬头望了望横梁，果断地说，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上两个钉环固定就行了。

人多力量大，众人七手八脚安好了宫灯。

土一身汗一身的萧野和森茂又开始忙着布置背景。萧野第一次上天安门就强烈地感到，天安门封建色彩太浓。为了体现他理解的革命气氛，他把主席台背后的八面大屏风用大木框罩住其中六面，留两面当门供领袖们出入休息。大木框正中放一个金色大

五星，20匹红布扯出长方形的光芒。立起来之后，大家连连叫好。

周总理来验收时，一眼就看出了红光五星的错误。“这是哪国国旗？”

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是越南国旗嘛，赶快拆下来。”

众人仔细一看，可不是，20道红光太浓重了，叠合在一起，太像一块长方红布上缀颗五星了。“我疏忽了，这不怪同志们。”周总理知道他审查设计草图时看到了这个构想。

萧野和森茂在设计时，也没想放射的光芒会在人们视野中连成一片。他俩二话没说，和大家一起动手拆下木框，恢复了天安门朴素的面目。

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像两侧，有两条永久性的长条标语，它们也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的手笔。中国人过春节有贴春联的习俗，但是对联一般竖立在门框两侧。天安门是扁长的建筑，不能采用惯常的竖贴法。萧野毕竟是东洋人，很易打破思维定势。他采用了横幅对称的设计博得了同行的赞赏。天安门城楼的两条标语不可能年年更换。胡乔木认为，标语内容一定要在什么时候都是合适的。集思广益拟出的标语经过了40年风雨，一直保留着它们出生时的面貌。这两条标语如果有知，它们会笑的。设计它们的萧野和森茂，不正体现了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精神么？

两人经历富传奇色彩

萧野和森茂在中国的经历中颇有传奇色彩的，萧野在1943年因是左翼美术家而逃到中国避难，他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师的工作。两年后，他与北平地下党接上了关系，通

过敌后工作部分分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是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别名。萧野一来就参加设计了《子弟兵与老百姓》、《戎冠秀》的布景，还为《白毛女》画了布景。到萧野设计《战斗里成长》的舞台时，他的艺术和思想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他把地主的深宅设计在高坡上，贫农的茅草房窝在山脚下，形成强烈对比。既符合山西山区的特点，又给全剧矛盾冲突的展开提供了典型环境。萧野的这舞台美术设计被同行视为范例。

森茂加入人民军队更是有意思。他原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个兵士，负责画反共宣传画。叫他反对八路军就叫他知道八路军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让他看马克思、毛泽东的书。森茂越读越觉有道理，终于让毛泽东的书俘虏过来了。

萧野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他和森茂一样十分热爱绘画艺术，无论是冀西的山村，还是冀中的平原，他俩走到哪画到哪，小本上画满了各式各样的速写。这对他们完成天安门宫灯的设计无疑是起了推波助澜之功。萧野在回国时，想带走那几本速写，却被海关扣住，如今速写本不知在何方了。但是，中国北方农村酒一样的醇厚的色彩已经融进他的血液之中了。

就这样，他俩一步一步成为中国通。他们设计华北军区颁发的华北解放纪念章，还设计了北京电影制片厂50年代的厂徽——工农兵塑像。然而，他们最得意之笔是天安门的设计。

两位日本美术家回国后生活一直很朴素。森茂经营一个出版社的插图工作，而萧野则靠举办兄弟画展来挣一点钱。他们俩都没有汽车。1956年，刘佳随中国京剧团出访日本，森茂夫妇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前去探望，森茂是在遣返回国的轮船上认识一位同返回日本的女子，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结婚了。萧野比森茂大十岁，他还滞留中国时认识了在医院当护士的日本女人，他俩生了一个儿子。

23年后，苏凡的爱人、著名影星田华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去日

本，她见到了老战友和他们的孩子。年轻一代第一次知道了天安门的故事。以后，苏凡夫妇和两位美术家鸿雁传书，像亲戚一样往来走动。苏凡给他们捎去锦缎被面和中华烟，使他们觉得大大地感动。森茂女儿一看见被面，就惊奇地睁大眼睛，很快把被面搂在怀里，喃喃地说，结婚时用。年轻一代还不理解两位老人怀念中国的深情，森茂看完电影《骆驼祥子》后，激动地说：“又看到熟悉的老地方了，西直门、西四的白塔、胡同、院子，旧北京的生活都反映到片子里了。”森茂高兴地与朋友坐到酒店里，边喝酒边谈观后印象，扯起龙须沟。萧野画展表现的东京庶民的生活颇有龙须沟的味道。以后森茂从《人民中国》上看到凌子风的照片，想起他还留着在张家口演杨白劳的风貌，又扯起他乱线头般的回忆。

森茂在给苏凡、田华的信中写道：我已是66岁的老头儿，可是我平常对妻子、女儿说，我的生涯中最幸福最有价值的时间是在中国。庄严的天安门，美丽的大宫灯，在我的脑子里不断往来往来……

这是森茂1980年写的一封信。萧野和森茂回国之后，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在信中流露了再看一眼天安门的心愿。苏凡和田华去聂帅家做客时，把萧野二人的情况告诉了聂帅，聂帅也认识这两位日本友人，他说，你们写个报告，我批转给有关方面。回家后，苏凡两人一商量，我们算什么，我们怎么能起草报告？这事就搁置了。

几年过去，中央电视台抢到了这条报道线索。苏凡希望他们以中央电视台的名义邀请两位日本美术家来中国参加40周年纪念活动。